



Yuwai de
域外的視界

——語言文學論稿

Shijie

鞠玉梅 著

國際華文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鞠玉梅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域外的視界

——語言文學論稿

國際華文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的视界/鞠玉梅著.-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8. 12

(复旦中文博士后文丛/庄伟杰主编)

ISBN 978-0-644-31407-7

I. 域… II. 鞠… III. 语言学-外国文学-研究文集-当代 IV. 198

国际华文版本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8 号

责任编辑: 方捷 封面设计: 刘鹭珊 版式制作: 潘春英

书 名	域外的视界——语言文学论稿
作 者	鞠玉梅
出版发行	国际华文出版社
印 刷	奔驰艺术印刷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0-644-31407-7 / I · 100
定 价	RMB: 30.00 元 AS: 18.00 元

地 址 (1800) 悉尼艾士菲区邮局 1810 号信箱
中国联络 (361005) 厦门市顶澳仔 12 号 067 信箱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隽永的记忆

——写在《复旦中文博士后文丛》出版之际（代前言）



域外的视界

走在永远的路上，如果说文化的确是一条苦旅，而生活有太多的乱花迷眼的话，那么，我们为何依然喜欢坐在自己的掌纹上，乐此不疲地用手指弹奏文字的风景呢？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唯有沿着心灵必须的指向，寻觅通往灵魂出口的路径，才是最为理想的选择。这已然成为一种宿命，我们别无选择。于是，相逢于羁旅中并成为地地道道的同路人，我们顿生莫名的感奋、欢呼和激动，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好的暗示，毋宁说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缘。正是这份缘，让我们走在一起，走在令多少人向往和欣慕的复旦校园里，开始了我们拥有的尽管只有两年宝贵时光的博士后生涯。

难忘的是那个星光灿烂、充满欢声笑语的夜晚，那是我们2006年秋季进站的十多个复旦中文博士后相聚欢饮畅谈的特殊日子，仿佛有来自神谕的降临，昭示我们展



开一项如同文学艺术一样“有意味”的方式，并定格成珍贵而永远的记忆，留在复旦求索的生活经历中，留在我们特定的生命风景里。于是乎，我们怀揣着一份梦想和意愿，放开心情，寻找默契，那种心领意会的灵犀仿佛苏醒的黎明即将铺展一席盛宴。我们在相互探讨和沟通中终于达成共识，决定联袂出版一套“复旦中文博士后文丛”。就这样，我们怀抱真诚，擦亮时间，像谛视春天悬挂于树冠。我们开始打磨内心的思考，一边争分夺秒地进行博士后科研的选题、酝酿和运作，冀望能有新的奇迹诞生；一边踩进时间的裂缝，整理和汇集平日里留下的思想麦穗。

播种的季节总是令人绽满了希冀的欢笑；

耕耘的日子多少流淌着难以言喻的疼痛。

加盟这套文丛的博士后同仁，大多来自大江南北的各个高校或科研机构，每个人的研究路向即使不尽相同，不同人的文化背景、人生阅历和心路里程也各有千秋，但我们曾经都拥有过“郁郁乎文哉”，在文化空间开阔、学术氛围浓厚的复旦校园，我们企冀让生活书香化，让生命诗意化，让领悟思辨所律动的话语如月华丁当作响，静静地流注在曾经走过的校园上，一路铺开流霞般的心灵回声……

中国博士后制度是邓小平先生于1985年根据诺贝尔获奖者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亲自决策创立的。这项制度作为一项培养年轻人才的全新模式，探索了新的用人机制，促进了人才的流动，吸引、培养和稳定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践证明，中国博士后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凝聚和吸引人才，在使用中培养人才，把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相互结合，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成长。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中国高校和学术界正掀起了学术创新的热潮。许多青年学子勇于探索，不懈努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科研能力

和写作实力。为了继承百年复旦形成的优秀学风和发扬前辈大家的治学精神,充分展示复旦中文博士后群体的实力风貌,促进人文学科的繁荣壮大,为青年学者们提供一个言说和发表见解的平台或窗口,集中荟萃他们平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所思所想,在校方和系部等的大力支持和认可下,复旦中文系2006年秋及部分2007年进站博士后决定率先编辑出版《复旦中文博士后文丛》,并由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向海内外推广发行。

博士应为博学之士,除了撰写长篇学术论文外,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接触的更多的是理论与实际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与人生的诗性体验,而且善于思考,具有创新意识,常常有感而发,要言不烦,独具慧眼,不论是专题论述或随笔杂感,无论是学习札记或吉光片羽,都不失为博士本色。对于博士后而言,日常生活中哪怕是短小精悍的片言只语、深入浅出的灵悟碎片,往往妙不可喻,只要能及时充分地传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言之有物,有的放矢,比起套话连篇的长文大论尚在流行的今天,相信更能让读者产生兴趣,也值得自己善待和珍视。

认真说来,这套由我们自愿自发倡导和编辑的文丛,旨在提升人文精神品质,展示青春学术姿态。每部书稿内容灵活自由,不拘一格,清新可读,散发着或浓或淡的人文情怀,弥漫着或深或浅的人文精神。有站在跨文化视野中打通对接诗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注重创作与批评研究间的互动对文心与诗学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寻幽探胜和展开当代性的思考;有密切关注和探寻女性书写的诗学建构,为深化女性文学研究频添了新的价值尺度提供新颖的视角;有借助中西文化理论,把聚焦点延伸至域外视界对外国语言文学加以深入细致的阐释和别开生面的探研;有把研究视角转向台港文学的文化生态和写作范式,高屋建瓴地采取整体性的考察与颇具见地的审视;有以富有思辨色彩和深微的艺术感悟,对女性书写和电影生发富有学理性和某种价值判断的独特观照;



有从比较文学到比较电影乃至动画艺术力求作出多方位的观察和专题性的研究,表现出可贵的理论热情和探索勇气;有通过边缘的美学与美学的边缘的双重视域,对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文艺以及民歌之美加以沉潜的发掘和探讨;有以现代性与传统性兼容的视角切入,从中西艺术精神到解释学等话题作笃实深化的系列性描述和美学透视……在一个思想混乱且缺乏思想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能看作是一种寻求沟通的思考和理解,并希望通过各自的存在方式,能够开启自我思想的存在空间,能够展示出不同思维的某种取向,以各自呈现的思考状态在感悟中通向人类心智的深邃与博大。如果说意义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东西,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轻有重;那么,严格说来,意义又是不可视或不可见的,它是一个由客观变为主观的过程。对此,我们既不必诘问原因何在、也不轻言结果会是怎样,而是完全沉浸于对过程的感受。唯其如此,这个过程才显得更有意思,才更值得我们去加以领略。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提高文丛的档次和品位,表达对博士后联系导师的敬意,我们敦请复旦中文系部分博士后导师和专家组教授担任顾问。著名学者章培恒、陈思和教授作为首席顾问,在百忙之中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建议和重要指导,为我们更有信心地推出这套文丛而注入动力源;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办公室主任顾美娟老师、原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秘书李玉珍老师等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在感动之余倍增了勇气和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她)们的精心指导、热心鼓舞和鼎力支持,这套文丛是不可能应运而生的。当我们手捧着这套堪称沉甸甸的丛书时,内心除了感激感恩之外,似乎吹拂着一缕暖洋洋的春风,在路上撩拨着一种存在的安详和幸福,时刻浸润我们难以平静的心田,而且摇曳成收获时节色彩斑斓之花结出的果,令人在咀嚼之时,平静

而愉快地回味着所有展开的情节和经历的故事。

但愿数年、数十年之后,当我们回眸往昔,追忆在复旦曾经拥有的那段美丽而多彩的时光,我们呈示的这份不算深刻却也鲜活的心智、编织的这份微小的却是笃诚的精神产品,或许有点青涩,却未老化,一如我们的呼吸,依然在搏动着奔腾的灵魂。那么,这套文丛所生发而凝聚的文字结晶,将会成为一份洋溢着诗意的隽永,连同我们曾经拥有的快乐和激情,一起滋润我们不断延伸的岁月。倘如是,就足以值得开怀欣慰一番了。

《复旦中文博士后文丛》编委会

庄伟立 执笔

2008 年春天写于复旦校园



域外的视界

序一

鞠玉梅的《域外的视界——语言文学论稿》(下简称《论稿》)将作为“复旦中文博士后文丛”的一种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事。长期以来鞠玉梅专门从事英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把书名取为《域外的视界》,正表明该书是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介绍研究对象的。《论稿》选录了作者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最初几年所发表的论文30余篇,是其在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道路上一段艰辛探索历程的纪录。

作为一部论文集,《论稿》的内容涉及了语言、文学领域的众多方面。在文学方面,既有对单个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的思想 and 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有对不同作家的对比研究;而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既有国外传统语言理论的,也有新语言学流派的介绍和探讨;有对英语各种构成要素的结构研究,也有修辞学、语言运用以及语言教学的研究,而文体、语体和语篇(篇章)更是其着力研究的重心。值得注意的是,《论稿》中文体、语篇的研究常常是同对语言要素以及修辞方式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表现在对英语词汇,包括英语谚语、俚语等各种英语习语的研究上,而且在对英语语法特点以及修辞方式的研究上都是如此,力求揭示它们的特有文体效应、文体意义和语篇作





用,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研究的较好结合。这种研究使得语言要素等的研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文体特征和篇章研究也因为依托于语言物质基础而变成是真正可以把握说明的。鞠玉梅是一位在文体、语篇研究上有着较大影响和应有学术地位的青年学者,上世纪90年代,她的专著《英语文体学》即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最近的《语篇分析的伯克新修辞学模式》以其特有的视角和开拓精神为学界所称道,《论稿》中的这许多联系文体、语篇问题研究英语词汇、句法结构和语义的论文,更是着重从新的角度切入对语言学传统领域进行了新的发掘,富有新意;而论集中有关功能语言学视角的信息结构研究、对西方新修辞学理论,包括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作为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代表的戏剧五位一体理论等的研究,以及关于这些理论的发展趋势的评述等等,则更是有着许多新的理论阐发。可以说,《论稿》在英美语言文学的研究上,是以其对传统领域的别开“新”面的探索和对语言学新问题所作的前沿性研究而显示其应有的价值的。

此外,从实际的研究过程看,在《论稿》中有些研究方法被作为基本的方法而“一以贯之”地加以运用,不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形成了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

其一是重视不同语言、文学的比较研究。《论稿》极为重视英汉语言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这表现在对英美语言文学的评介研究并不只是停留在单方面地对英语语言文学的泛泛介绍说明上,而更多地是将其同汉语语言、文学作品的特点结合起来考察,并置于相关的文化背景上在相互的对照比较中进行分析解释,无论是在词语、句法层面,还是篇章、文体层面都有着这方面的切实努力;重视比较研究是《论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明显特色。记得,“文革”前在我当研究生时,导师陈望道先生在讲到当时的一般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其实缺少“一般”性以及外语学习等问题时,曾说过:搞语言学研究至少必须学好(指达到精通的程度)

一门外语,最好还要能熟悉其相关的文化背景,这样不仅可以直接地接触原著,扩大理论和资料的来源,更重要的是才可能进入更为深入的层面对不同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真正做到科学地总结特有的和普遍的规律,使一般语言学真的名副其实地做到“一般”。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现在,学习外语,掌握一门外语的可说比比皆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外语热的背后却隐伏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就如一位英语教学和研究著名专家所说的:“大部分英语学习者有变成‘学舌的鹦鹉’”的趋势。导致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在认知上,缺乏对语言是为文化载体的认同感,由于急功近利,搞外语的不重视汉语和相关的背景文化,不愿在汉语语言和相关文化内涵的基本累积上多花功夫,而同时对英美语言及其文化背景也缺少深层次的了解把握。也正因为此,这位著名的专家提出,“学英语时,一定要把汉语作为维系民族精魂的纽带。”“要时时把它(英语)与汉语进行比较,形成两个‘语言频道’,思维的自由转换才是更高的境界,切不可失落汉语这个中国人的‘魂’”。^①两代学者分别从语言科学的理论总结和语言教学实践这两种不同角度所谈到的中外语言学习和研究上须重视对比研究、相互发明问题的有关看法,在今天是尤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外语教学和学习效率的提高,并且还有着加深理解和研究深度,提升语言学研究境界和品位的作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论稿》正是在中外语言文学比较研究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论稿》作者长期从事英语的教学和研究,对当前英语教学和研究上所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体会,在她看来,外语学习、对比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的研究,应“加强对两种语言的深



^① 参见《学英语岂能成“鹦鹉”——陆谷孙认为,“江湖英语”大有包围“庙堂英语”之势》,《文汇报》2007年8月20日。

层次对比研究”，唯有如此才可能克服上述的弊端真正收事半功倍之效，重视对比研究正是基于其希冀能解决的急切心情而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她所走的正是一条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经过探讨研究发现规律再反过来用以指导实践的路。实践证明其做法是富有成效并很有价值的，其中对比研究的内容大多显得切实而有新意，有些研究能较好地就相关语言所共有的和特殊的规律作出了科学的揭示和解释，显示出一定的研究深度。相信这种努力必将会给人以启迪并给实际的英语教学和研究带来积极的作用。

其二是重视文学与语言间的交叉性研究。对英美文学的有关作家、作品特点和艺术特征所作的分析解释，《论稿》作者非常重视将其建立在语言物质的分析基础之上。其具体做法，即是通过对作家作品语言表达形式上的综合的或部分特点的描写以对作家和作品的整体艺术特色进行介绍分析；可以说重视文学与语言的交叉研究是《论稿》在研究方法上的又一特色。长期来我一直在从事着语言风格、文体的研究。所谓语言风格也就是作家、作品的语言运用的特点综合；而文体则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综合而成的整体特点的体现，文体的构成除了其他因素外，其结构体制须臾也离不开以功能变异的语言为（形式方面的）构成因素。无论是风格还是文体，都是作家作品整体艺术特征的体现。因此，对是为语言艺术样式的文学而言，艺术性的分析论述，理应重视从语言形式，从语言运用特点等方面切入研究，这样才能以物质性为保证；真正从表现形式上去把握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并作出切实的描述和科学的解释。但实际上，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正是极为薄弱的环节：有关作家、作品的介绍分析常见的情况则更多地是侧重于作品的思想、主题等的述说，（这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比较地忽视甚或脱离对语言运用的特点亦即物质性，所谓艺术风格特征的分析、解释常常显得浮泛甚至谰陋。《论稿》作者由于长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似更侧重于语言学的研究)的缘故,既对英语语言及其运用特点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把握,同时也对英、美文学有着广泛的接触,因而她的英美文学的研究明显地表现出同语言学的密切相关性,这为经由利用对言语和表达形式特点的系统描写来分析解释作家作品提供了有利条件,论集中的不少有关介绍和论述作家、作品的论文,从语言运用特点的综合上,亦即透过语言物质性来对艺术特色进行分析解释,就显得切实而具体。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通过以语言运用特点的分析来阐释文学艺术特色的做法让人感到真切,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对艺术特色来说也因此而变得不只是可以意会的,同时也是可以言传的。这种研究方法,在实际地增强阐释力的同时,有着恢复文学本体研究的意义,有助于文学研究科学性的提升。

近几年来,有多位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进入复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鞠玉梅是其中的一位。忝为联系指导教师,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彼此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都希望能在外语研究的既有基础上经由博士后研究更多地接触和深入地了解把握汉语,通过比较研究以求对语言的相关问题作出更为准确、科学的规律性揭示。从这一角度看,《论稿》可说是作者从事这类相关研究既有成果的小结,同时也应该是这方面深入研究的始基。自2006年9月进站以来,鞠玉梅在科研上所表现出来的踏实刻苦,精益求精的学风,对学术新思想理论的敏感性和知难而进、勇于探究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她在今后的学术征途上必定能走得更为稳妥扎实,取得更大的成就。是为序。

李熙宗

于复旦大学凉城宿舍

2007.9.1

序二

鞠玉梅教授暑期亲自送来她的书稿《域外的视界——语言文学论稿》，嘱咐我读后赐序文一篇。我和玉梅接触次数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她是个有多种能力的人，多年来都是双肩挑，院系管理工作、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读学位等都能综合兼顾，而且都做得很出色，实在令人佩服，真可谓我们外语界的“女中豪杰”，我们为她骄傲。

我看过她送我的两本专著，一本是《英语文体学》（1999），另一本是《语篇分析的伯克新修辞模式》（2005），从书中得知她不但重视实践与应用的研究，而且特别倾注于理论的研究和新模式的构建，这是许多女性学者（当然也有不少男性学者）所不及的。

这本《域外的视界》是由她发表的文章集结而成的文集性质的著作，分4个部分，外国文学探幽10篇；语言学探索23篇；外语教学与研究4篇；两篇附录属于诗学的翻译。我虽然粗略读了一遍，但以下几个方面引起了我的深思，令我难以忘怀。

首先，她在努力追求多领域打通，走着信息时代要求的综合研究的治学道路。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这个时代有许多新的特点，但从学术发展的视角来看，最主要的特点是各



学科向高度综合化和高度专业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就是说专业化的创造必须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当代的学者要追求多领域打通,不管研究哪个领域,都应该追求中外打通、古今打通和文理打通,这是大的方面。就是小一点的领域也要追求打通,比如你研究语言学或文学,那首先语言学和文学要打通,此外还要跟哲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美学、传播学打通。再比如你研究语言学的任何一个分支学科,那就得把语音、语义、语用、句法、篇章、修辞、文体的研究都打通。如果研究修辞学,那语篇、语用、修辞、文体的研究就更要打通。玉梅的文章告诉我们她在走着多学科打通的治学道路。首先是文学和语言学打通,其次文学中又有诗歌、小说、诗学的研究,语言学中又有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语篇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真是大打通中有中打通,中打通中有小打通。

其次,她的文章中有微观研究,有宏观研究,也有二者结合的研究,这表明她追求的是科学的方法论。1997年我在《英汉语比较与翻译》(2)的《编后记》中说:“微观研究是基础,宏观研究是导向。从微观研究起步,而后逐渐进入宏观研究,然后再微观-宏观-微观-宏观……循环下去。这是研究人才成长的过程,也是学科建设的过程。”玉梅的文学研究中既有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也有文学流派的探讨;其语言研究中既有辞格、谚语、俚语、幽默语言的探微,又有名家理论的系统介评和学科传统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她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称道的。我们的学术传统比较强调微观研究,强调应用,强调实践,这都没有错,但是绝不能以强调这些方面为理由来弱化或反对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钱串子观点”说铜钱好比语料,串钱的绳子好比理论,没有钱,钱串子有何用?这是说语料在前,理论在后。这里潜藏着一个我们长期糊涂的问题:你收集语料是完全随意毫无目标的吗?肯定不是。什么东西指挥你收集这些而不收集那些语料呢?那只能说是跟研究相



关的理论原则或指导思想。所以学术研究不是材料在先,而是理论在先,归纳法是这样,演绎法更是这样。指导收集材料的理论是已经有的理论,研究过程中要以已有的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创造新的理论,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真实过程。

再者,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之一,不可忽视。我在给马祖毅先生的《中国翻译简史》写的序中说过学科史的重要性问题,这里再做些补充。无史则无根,只有根深,才可能干壮叶茂。学者的成长也如此,如不能深入系统地了解自己所研究学科的历史,那就难以走出肤浅之境,因为你不知其来龙去脉,也因此很容易犯“对症下药”的错误,因为很多同类“症”是有不同病因所致,不知其病源,怎能根治其病?人类的同类思想与感情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就是在同一民族语言中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即“一义多构”,这种“多构”的形成过程是很复杂的,根源也是各异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怎么能找到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跟风”之习气盛行,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历史观念和轻视历史,不重视过程,只追求结果。研究历史目的是贯通古今,求其同,是认识和维护民族之优良传统,延续民族之精魂;求其异,是认清历史发展之规律,明了现今变革之必然,以推动社会进步。陈寅恪(1939)在《读<哀江南赋>》中说:“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见《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这是说的文学创作如何贯通古今,但历史和其他学科虽不可“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但“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却是通则。我们所说的学科发展史主要指理论史,当然也包括学科研究对象的发展史,比如主要指语言学史、文艺学史、翻译理论史,也包括语言史(英语史、汉语史等)、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翻译史(中国翻译史、外国翻译



史等)。玉梅在修辞学研究中关注了学科理论史的问题,比如她在《从西方修辞学的新理论看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中通过评介西方修辞学理论的新发展,探讨了当今修辞学发展的五个趋势:古典传统的复兴;对象和功能的多元化;阐释人类行为;修辞过程和交际互动;修辞的认知性。在《中西修辞学传统的思考》中,通过发展史的比较,找到了中西修辞学传统的三大共性和两大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异同的两个主要根源,为学科的新发展提供了助力。

还有,比较研究和中西结合。比较和结合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玉梅这本文集中有多篇文章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她比较了英汉诗歌的格律,比较了英汉语篇中词汇和语法衔接手段及其文体效应,比较了中西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传统,还运用 Swales 的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对英汉学术论文摘要做了对比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分析了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而且都在理论或应用上有新的发现或开拓。比较的方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研究方法的主流。基于人类认识世界的现代精神:不断转换参照系(reference frame),使认识逐步趋近事物的本质属性。人类认识世界包括学术研究的发展模式主要就是观念的改变与方法的更新。这种趋势从上个世纪中期以后就愈来愈明显了。语言学中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词汇主义等都是研究方法,英语都叫 APPROACH (汉语叫“路子”或“套路”较好,比“方法”抽象程度高,范围大)。翻译学中的 science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polysystem theory, deconstruction, manipulation school,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scopos theory, 还有 feminism, reductionism, cannibalism 以及 linguistic translati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cultural translation, ecology of translation 等等也都属于 APPROACH。这些研究方法都包含着两个系统的比较,一个是横向系统,即研究对象跟参照系的比较;另一个是纵向系统,即本研究系统的古今比较。这两个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